

理性的僭越

李庆宗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摘要: 理性本来是非自足的,然而当把理性看作是自足的,把它变成人类存在的充足理由和充分依据、变成人类及其存在的唯一和终极的尺度时,就会导致理性的僭越。这一方面表现为理性的独断化。将理性凌驾于价值之上,取消价值的合法地位,使理性成为不受价值约束的绝对原则,其直接后果是科学主义盛行和技术至上的泛化。另一方面表现为理性超越其适用范围,变成自然、社会乃至人生唯一的、独断的谄然模式,并试图使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理性化、技术化。理性的僭越,使其从人类肯定、发展自身的一种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和不受人的价值取向规约的规定性和力量,人却失去了价值主体的目的性意义而沦为技术操作的对象。

关键词: 理性;价值;僭越

中图分类号: B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4)04 - 0004 - 03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充分显示了人类理性的巨大胜利,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相对论的创立打破了旧有的时空限制;空间技术的发展使人类遨游太空成为现实;DNA等分子技术揭开了人类生命的奥秘;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实现了人类生存方式的数字化和虚拟化,等等。然而,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和技术社会的形成,人自身的存在价值开始受到挑战,在技术理性的凯歌猛进中,人似乎逐渐失去了其主体性而趋于对象化乃至工具化,理性由自我肯定的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与之相联系的则往往是存在意义的失落和价值的危机。

一 理性的限度

理性并非是自足的,更不是万能的。首先,理性无法确保最初的前提。科学理论中常常包含着一些无法用经验直接说明、也无法从理论本身推导出来的基本假设,在该理论范围内,这些基本假设是超验的、思辨的、形而上学的。这就是说,任何科学理论都有自己无法证明的逻辑前提。“当然,人们证明一个前提可以通过从更深层次的前提中得出该前提的方法。但即使这样做成功了,问题仍然没有消除,而只是转移了,即把不确定性转移到更深层次前提的确定性去了。为了确保它们的确定性,人们不得不回到更深层次的前提,但同样的问题又会发生。换言之,通过论证来保证前提

的确定性只能导致无穷的倒退。”^[1]因此,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一切科学理论都无法自己说明自己、自己规定自己,它们都是非自足的。正如波普尔所言:“我的理性主义不是自足的,而是依赖于对理性态度的非理性信仰。”^[2]帕斯卡尔认为:“理性思考的前提是人主观设定的。就是说,对于一种以理性为方法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来说,它的前提是超出理性的。人只能‘相信’理性所依据的前提是正确的。理性必须有非理性的东西为前提。这是理性主义在知识逻辑必然性方面遇到的困难。尽管以非理性的东西作前提并不意味着必须以信仰为前提,而且也可以以经验知识为前提,但理性推理的前提不来自理性却是无疑的。”^[3]理性推理的前提是理性所无法证实或证伪的,不仅实践上,而且逻辑上也不具有可能性。

其次,理性是价值中立的。理性的价值中立性,决定了理性倘若离开价值对它的意义赋予,那么理性对于人的存在来说就无从呈显出自身的意义。理性只是一种事实描述和实然判断,只具有手段的规定,而不具有目的性规定。科学既不是唯一的真理、不能拯救人类,也不会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科学不过是一种工具,是中性的、价值无涉的,它本身无所谓好坏,它究竟能给人们带来什么东西,完全取决于价值对理性的范导作用。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

【收稿日期】 2003 - 06 - 11

【作者简介】 李庆宗(1966 -),男,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

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4]英国著名物理学家J·D·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人们过去总是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会导致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但是,先是世界大战,接着是经济危机,都说明了:把科学用于破坏和浪费的目的也同样是很容易的。”^[5]众所周知,理性和价值体现着“是”与“应当”的划界和分野。英国经验论的代表休谟认为,价值判断决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从“是”无法推出“应当”,这一问题,成为后世思想家无法回避的精神“卡夫丁峡谷”,同时启示了康德关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M·韦伯就曾把科学比喻为一张地图,它只能告诉人们怎样走,而无法告诉人们应往哪里走。“柏林学派”的赖欣巴赫明确指出:“科学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应是什么。”^[6]因此,理性作为对客体结构中必然联系的揭示,它本身并不存在任何选择的可能性,因而在一定意义上,理性无法为自己的一切社会后果和实践效应承担任何责任。理性的这一特点决定了理性需要价值的范导。^[7]理性若没有价值的赋予和规约,也就无从显示其对于人的存在的和发展的意义,也就无法作为实践观念被纳入实践的构成要件之中。

二 理性的僭越

本来理性是非自足的,然而当把理性看作是自足的,把它变成人类存在的充足理由和充分依据,变成人类及其存在的唯一和终极的尺度时,就会导致理性的僭越和张狂。这一方面表现为理性的独断化。将理性凌驾于价值之上,取消价值的合法地位,使理性成为不受价值约束的绝对原则,其直接后果是科学主义盛行和技术至上的泛化。另一方面表现为理性超越其适用范围,变成自然、社会乃至人生唯一的、独断的诠释模式,并试图使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理性化、技术化。理性僭越与泛化,使其从人类肯定、发展自身的一种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和不受人的价值取向规约的规定性和力量,人却失去了价值主体的目的性意义而成为技术操作的对象。

西方近代化以来,随着去圣谥神、入世还俗的世俗化运动的兴起,上帝被扼杀在理性之剑下,“上帝的万能”被代之以“理性的万能”、“科学的万能”。当欧洲人从中世纪长期“冬眠”中觉醒之后,先进的思想家们对作为中世纪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以贬低理性和抬高信仰为特征的传统宗教和神学以及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的经院哲学,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并全面论证和极力讴歌人本身所具有的理性能力,这漫漫然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因此,由关注神到关注人,由重视“来生”到注重今世,人们的注意力由彼岸的天国返回到现实的人间,“提倡理性,限制信仰”由此成为那个时代的强音。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德国的宗教改革,再到法国的启蒙运动,其实质就是理性代替信仰。连哲学也不例外,“近代哲学以理性主义为基本特征,它试图以理性取代神学的权威。”^[8]所以说,理性主义是作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对立面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理性主义在其早期有其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意义,尤其是在反对宗教迷信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等方面起过巨大推动作用。推崇理性精神的“资本主

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然而,随着理性的不断伸张,理性逐渐走向泛化,并进而成为统治人的力量,“人的存在被抽象化成了理性的化身,世界成了由人的理性所构建的世界”。^[10]

正如康德所言:“不受价值范导的理性是盲目的”。对理性的倡导若走向极端,则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进而导致理性的独断。苏格拉底“知识就是美德”的口号早已为西方文化埋下了理性独断的种子。他把知识看作人生的最高目的和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而知识是依靠理性思维获得的,这样理性就被认为是万能的,成了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支配者。如果说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确立了理性的自明地位,那么,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宣言不仅使人的目光从“天堂转向自然”,更重要的是它宣告人可以凭自己的理性自立于自然。^[11]理性便由非自足走向自足,进而走向独断,人的意义世界正是在这种理性的张扬中被埋葬了。“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指理性——引者注)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12]

三 理性僭越之后

在现代社会中,“理性僭越”现象越来越严重。在科学理性主义至上的致思取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了一条“见物不见人”的发展道路:“发展”=“科技进步”+“经济增长”。一方面,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人的精神世界却越来越空虚和无聊,陷入了“现代人的困惑”之中:诸如“精神的焦虑”、“信仰的缺失”、“形上的迷失”、“人生的危机”、“意义的失落”、“精神家园的丧失”和“人与自我的疏离”等等。理性主义带来的不是思想家所预言的人的普遍幸福和人性的充分发挥,而是种种痛苦和灾难以及人性的异化。这种异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二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理性主义认为,自然界是外在于人的、可以被人们任意操纵的对象,是供人“占有”、“消费”、“使用”的工具,是人类的“奴仆”。因此,技术变成自律的,它制造出一个无所不能的世界,具有自身规律,拒斥一切传统。这种自律技术行为像一个专制者,把文化改变成一个庞大的、整体性的整体。技术的自主性意味着原本作为人的自我肯定手段的技术变成了目的本身,而人却沦为技术的手段了。技术统治实质上就是理性统治,因为技术世界是由理性和进步确定的,而且进步观念只有在理性给定的框架内才具有自己的合法性。科学技术对大自然的征服,导致了“全球问题”的出现。当前人与自然关系上出现问题和危机的实质在于,人的活动的主体性效应和反主体性同步增长,人类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巨大本质力量由于不合理使用正在转化为巨大的破坏性异己力量,它不仅带来自然、生态、环境、气候、资源、能源、耕地、物种等一系列自然问题,破坏了自然再生产的稳定与和谐,而且由此而严重影响人类的整体性发

展,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存。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3]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资源匮乏、生物多样性减少、核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理性至上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反思。事实上,早在启蒙时期,正当人们为理性、文明、科学、进步高唱赞歌之时,卢梭就已经开始了对理性的批判和反思,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指出:“文明的进步总是伴随着人类不平等的深化和普遍的道德堕落。”^[14]马克思也曾指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15]的确,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困惑,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对世界的诠释不足造成的,而是在于意义标准的选择和赋予。^[16]因此,“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17]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理性不仅成了把握自然界的有效方式,也变为审视人生的有效手段,从而造成人对世界的感受和把握越来越“单向度”(马尔库塞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领袖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18]这也难怪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被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拉美特利断言“人是机器”;萨特惊呼“他人就是地狱”;霍布斯感叹“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人对人像狼一样”。理性精神支配下的人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塑造,从根本上说只能使人向物的层面不断沉沦,最终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道德疏离。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的呐喊,以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对“理性僭越”的深恶痛绝。

【参 考 文 献】

[1][德]W·威尔士. 理性:传统和当代[J]. 哲学译丛. 2000

(4).

[2]K·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509.
[3]陈宣良. 理性主义[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153.
[4][17]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6.
[5]孙正聿. 哲学通论[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124.
[6]赖欣巴赫. 科学哲学的兴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22.
[7][16]鲁鹏. 历史之谜求解[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156、169.
[8][14]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哲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306、342.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7.
[10]刘放桐.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
[11]金延. 理性主义辩证[J]. 哲学研究. 1996(2).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55.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83.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
[18]刘放桐.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82.

(责任编辑 许玉俊)

书 讯 ·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及整合

李宏伟教授所著《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及其整合》一书,已由中国市场出版社(2004年)出版。

该书是作者在陈昌曙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全书共23万字。主要包括: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技术价值观、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社会分析、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环境危机、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实践整合、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中国现实。有需要者可与中国市场出版社(010-68021338)或作者本人(0312-5099160)联系。